

从文物看蛇的传统文化寓意

□ 杨曙明

蛇是一种古老的动物，不仅出现较早，而且分布较广。据考证，蛇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距今1.3亿年前，全球各地几乎都有蛇的踪迹。“蛇”在甲骨文中作“它”。《说文解字》载：“它，虫也。从虫而长，象屈曲垂尾形。”又说：“上古草居患它，故相问‘无它乎？’”这个“它”是“蛇”的古体字。因那时蛇害对人的威胁无处不在，所以朋友熟人碰面，往往都要问：“没碰到蛇吧？”后来，这个“它”字被假借为其它的“它”，久而久之，逐渐失去了蛇的本义，于是就将“它”字另加“虫”旁，产生了“蛇”字。另外，“巳”旁，古意作“蛇”解。“巳”为‘它’（蛇）象形”。十二生肖中就是以“巳”配“蛇”的，巳时即蛇时，巳年即蛇年。

从我国发掘出土的文物来看，自新石器时代开始，文物上就出现了蛇的形象，但与龙、虎等生肖动物相比，在我国古代文物中，蛇的形象并不很常见。从现有的遗存来看，蛇的形象主要出现在陶器、铜器、瓷器、瓦当、铜镜等文物上。这些文物中蛇的形象，或描绘、或刻划、或雕塑，大都形态逼真，生动活泼，真可谓千姿百态，神秘莫测，从中可以窥见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丰富寓意。

图腾之蛇。在中国古老的民俗文化中，蛇曾是吉祥美好的象征，是中华民族最早的图腾之一。作为一种古老而原始的爬行动物，蛇冰冷的躯体与身上的毒液使人感到害怕，没有四肢却能迅速游动、攀高、穿缝、入洞，灵巧无比，给人一种神秘感。人们逐渐由恐惧、敬畏而发展为将蛇作为图腾加以崇拜。此外，蛇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兽——龙的主要原型动物之一。龙是中华民族

的图腾，是由蛇的形象融合其他动物形态想象演化而来，龙的主体仍是蛇的形象，故人们常称蛇为“小龙”。由此也可看出，蛇作为一种图腾在古代先民心中的重要地位。

从新石器时代出土的蛇纹蟠龙纹筒形陶罐、红陶贴塑蛇纹罐，以及石峁遗址出土的蛇纹石雕、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陶堆塑龙蛇纹透底器等文物来看，在龙

这个神兽没有完全演化定型之前，蛇被古代先民视为崇拜的对象，有些还可能作为部落图腾。《山海经》中记载的蛇神就较多，有操蛇之神：“夫夫之山……神于儿居之，其状人身而身操两蛇，常游于江湖，出入有光。”有蛇耳之神：“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两龙。”有以蛇做守护之神：“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齿，食稻啖蛇，一赤一青，在其旁。一曰在竖亥北，为人黑首，食稻使蛇，其一蛇赤。”至今福建一带还建有蛇王宫庙，并保留有过蛇王节、游蛇灯的习惯。

创世之蛇。在中西方创世神话中，“蛇”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是中国创世神话中的形象。在中国文化中，伏羲和女娲的人首蛇身形象暗示着生殖与繁衍。他们被认为是人类的始祖，通过交尾创造了人类，蛇身的交缠可能象征着两性的结合，这种结合带来了人类的繁衍。而且在民间文化中，如“蛇盘兔，必定富”的剪纸图案，也表达了对多子多福的生殖崇拜。蛇能够蜕皮而求得再生，这一特性也让它成为一种“福祿寿”的象征，人们将蛇与生命的延续和再生联系起来，认为它具有神秘的生殖力量。

在汉代出土的画像石、画像砖和彩绘帛画中，伏羲和女娲的神像都是被描绘成人体蛇躯蛇尾的形貌，或双手捧着太阳和月亮，或手中分别执

着规和矩，下体的蛇躯和蛇尾有时也画成龙躯和龙尾。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

唐群臣墓出土的唐代绢画中，群臣围绕中的伏羲和女娲的蛇躯和蛇尾，更是亲密无间地交缠在一起，显示出神异的艺术造型，更寓有对后世子孙繁衍的期望。

生肖之蛇。我国农历是以干支纪年，凡地支“巳”即为蛇年。古代天文学家将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依照十二种动物的生活习性和活动规律确定为十二生肖。夜间十一时至次日凌晨一时属子时，是老鼠趁夜深人静频繁出入活动之时，称为“子鼠”，以此类推排列为“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巳蛇”是根据上午九时至十一时为“巳时”，此时朦胧的雾

气已渐渐消散，天空艳阳高照，蛇会出穴觅食，故称“巳蛇”。

从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秦简的记载来看，十二生肖的说法在春秋前后就已经存在。十二生肖陶俑常见于隋、唐、五代及宋代墓的陪葬品中，陶俑的形象，有的是人俑带生肖；有的是人身生肖头，有的是人捧生肖，姿态各异。

祥瑞之蛇。蛇还被视为象征吉祥之物，在《诗经》中，蛇还是生女的吉梦，所谓：“维虺维蛇，女子之祥”。《史记·封禅书》载：（秦）文公梦黄蛇自天下属地，其口止于郿衍。文公问史敦，敦曰：“此上帝之征，君其祠之。”于是作酈畴，用三牲郊祭白帝焉。当时的史官认为，黄蛇是“上帝之征”。可见蛇不仅仅是小龙，有时与龙的地位相近。秦末刘邦曾“斩白蛇起义”，白蛇被指为“白帝子”，“帝子”当是龙，可原形却是蛇。据魏晋志怪小说《拾遗记》载，三国时东吴丞相张昭的祖母曾乘轻舟游于江上，忽有长蛇腾入舟中。卜人告之，此吉祥也，子孙当贵，后其子孙张昭位至丞相。所以，蛇的出现往往被视为吉兆，其形象也常被制作在瓦当、印纽、铜镜等器物之上。

以现藏于首都博物馆、出土于北京昌平的西周早期蛇纹纹饰为例，盾饰钺在盾的正面，具有加固、装饰、威慑的作用。此盾正面饰一盘绕的蛇，蛇头居于正中的上部，呈S形，既展现了蛇的威猛和震慑作用，又赋予盾牌蛇灵保佑平安的美好寓意。

方位之蛇。蛇的形象也被用来代表北方的玄武，其形貌是下龟上蛇交缠一起。玄武起源于中国古人对宇宙的崇拜，早在殷商时期，古人就把星空分成二十八个星座，称为“二十八星宿”。而二十八星宿又分为东、南、西、北四组，人们把南方的星星想象成一只大鸟的形状，称为“朱雀”，把东方的星星想象成一条龙

的形状，称为“青龙”，把西方的星星想象成一只老虎的形状，称为“白虎”，而位于北方的北斗七星，好像龟和蛇缠绕的形象，称为“玄武”。所以“玄武”就成为掌管北方的神灵。这也是人们常说的“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由来。《文

选》注云：“龟与蛇交曰玄武。”补注：“玄武，谓龟蛇。位北方，故曰玄，身有鳞甲，故曰武。”

汉代出土的四神瓦当中，玄武的瓦当形象就是龟蛇合体。北宋时期，玄武改成真武。明朝时期，由北方入继大统的明成祖，视镇守北方的玄武为其护佑之神，大肆崇祀真武。后来在道教中，蛇龟相缠的玄武，又成为北方真武大帝的神将。今日武当还保存有明代铸成的玄武铜像。

爱情之蛇。古代民间还将蛇与爱情密切相连，主要体现在民间故事《白蛇传》中。《白蛇传》描述的是一个修炼成人形的蛇精与人的曲折爱情故事，表达了人们对男女自由恋爱的赞美与向往。《续搜神记》《博异志》《聊斋志异》等均有蛇精化人的故事，但大多以悲剧收场，只有白娘子的传说长久为老百姓所喜爱，不断被编成戏剧、舞蹈演出，绘制成年画、皮影等，至今仍带给人以美的享受。

现收藏于江西省丰城市博物馆的元代青白釉白蛇传戏曲人物枕，长22.3厘米，宽13.8厘米，高14厘米。枕呈长方形，枕身雕塑成一座仿木结构的彩棚戏台，前后左右共有四个棚台，两侧彩门，窗口为透雕六瓣栀子花连弧图案，棚台前左右立双栏杆，栏柱顶端饰仰莲图案，中有台阶进入棚台，棚台内有各不相同的演出场面，分别为传统戏曲《白蛇传》中断桥、借伞、还伞、水漫金山等四出场景。

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到汉代的帛画再到唐宋的陶俑，从生肖巳蛇到《白蛇传》的传奇故事，蛇的形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都有着不同的象征意义。这些文物中的蛇形象不仅展示了古人对蛇的崇拜和信仰，也反映了蛇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特聘研究员）



由梁漱溟研究走进中国历史文化

□ 谭星

艾恺（Guy S. Alitto）是当今最活跃的美国汉学家之一，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学习中国历史文化，对中国饱含热爱，中国是他心中的“另一个故乡”。艾恺荣休前长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除了专注于梁漱溟研究、中国地方史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和现代化理论研究外，他还开设近代中国研究的课程，致力于传统中国经典选读、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教学工作，培养了许多对中国研究感兴趣的美国学者，为更多美国学者和公众客观认识中国架设起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

通过梁漱溟研究了解近代中国

艾恺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师从史华慈、费正清等中国学研究泰斗，他对中国的研究路径也深受其影响，大体上是

从西方文化和历史学进入中国，渐次至研究中国本身。当时美国汉学家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处于起步阶段，艾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了梁漱溟研究。梁漱溟对于汉学家艾恺的意义，不只是一个青年学者的崭露头角，也成为他走进悠久而深厚的中国历史文

用口述史记录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变迁

艾恺是一位历史学者，对中国地方史、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较深。出于历史学者的训练和敏锐，他在80年代造访中国时开展了两项重要的口述史研究。一项是对他的传记主人公梁漱溟进行一对一的采访、长谈，另一项是对山东邹平几百名农民进行访谈。

艾恺对梁漱溟的访谈集中在1980年、1984年和1986年，访谈内容现已整理、出版，读者从《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2010）和《这个世界会好吗？续编——梁漱溟晚年口述》（2024）两本书中可知其大概。艾恺完成《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时并无缘见梁漱溟，完全是透过文字认识他，访谈过后，艾恺对他的评价是“表里如一”。对梁漱溟的访谈不仅是印证或修订书中的判断，艾恺也将

其视为认识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和理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窗口和路径。对此他有清醒的认识：“我是历史研究者，自然会希望多多保存历史资料，而梁先生……曾经亲身经历、参与过这几十

年中国历史，而梁漱溟本人对近代中国历史的深入见解在书中比比皆是”。

以全球视野认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作为一个意大利裔美籍汉学家，艾恺在美国接受完整的学术训练，又在后半生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研究中。他具有相当广阔的文化视野，将中国置于世界范围内，以此来理解中国和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在艾恺看来，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包容性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独树一帜，是世界上任何其他文明都不具备的独有特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体现为中华文明在空间上的极强扩散性，以及时间上的极强持久性。他认为，早期中华文明并未局限于中国古代各个王朝的边界和疆土，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传播。直至今

天，世界范围内其他文化中的某些成分仍然以中华文明的某些元素为基础。而当中华文明被侵略破坏时，与其他文明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具有极强的韧性与生命力，总是能够在自身元素的基础上进行自我重建、自我修复。

艾恺谈道，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在西方文明的比照中突显。他认为，在地中海文明中，无论是政治团体还是宗教组织，都基于非此即彼的二元逻辑，具有很强的排他性。而在中国显然是另一种情况，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譬如古代中国对于战败方的处理方式较为温和，更多采取后续合作和战力吸收的原则。传统中国社会对于民间宗教信仰持一种宽松包容的态度，不同群体间对不同宗教经文的争论，并未像西方的神教文明那样导致严重的暴力斗争。

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的讲话中，谈到了清初赴日弘法的隐元大师，“在日本期间，隐元大师不仅传播了佛学经义，还带去了先进文化和科学技术，对日本江户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隐元在赴日前担任福清黄檗山万福寺住持，他在接到来自日方的第四次正式邀请后，于1654年率弟子30余人，开启了一段推动两国文明交流互鉴的弘法之旅。隐元带领弟子在日本生活长达19年，他们将中华佛教文化传播给日本民众，推动了日本佛教黄檗宗的创建与壮大，丰富和扩展了近世日本人的思想和视野，发挥了促进两国相互理解的作用。

架起日本持续从中国文明汲取营养的通道

1652年，长崎的兴福寺住持、唐船主、唐通事等邀请隐元赴日弘法，此后又多次传书表达对隐元赴日的期盼。日方的屡次诚邀表现出对中华佛教文化的迫切需求。在接到第四封请启函后，63岁的隐元决定接受邀请，并与万福寺的僧众约定三年后回归故乡。第四封请启函的内容显示，日方整个邀请过程都报告了长崎奉行所并获得许可。1654年，在隐元登陆日本后的翌日，长崎奉行就拜访了隐元，并将会见情况向幕府作了报告。当时的“唐三寺”即长崎的兴福寺、福济寺和崇福寺，此前主要从事唐人的葬仪，在弘法教化方面影响不大，而隐元致力于弘扬明代临济宗禅法，在僧团组织、寺院建制、佛事仪轨、禅风禅法等方面，为日本佛教界输入了新鲜血液。

隐元的到来，让中华佛教文化滋养的受众从僧人扩展至多个阶层。隐元到长崎之后，首先担任兴福寺住持，不仅当地唐人僧人全部投入隐元门下，还吸引了一些敬仰隐元的日本僧人大力协

助隐元在日本弘法。最具代表性的是临济宗妙心寺派的龙溪性潜，他在隐元赴日的三年前，就在日本阅读了记录隐元话语和思想的《隐元录》，并于1664年1月，正式成为隐元的嗣法弟子。在日本僧人的推荐下，隐元获得京都所司官的信任与支持，经其说服幕府的大老、老中等重臣，幕府逐渐放松了对隐元外游范围和参见信众人数的限制。隐元逐步得以踏出长崎，走向京都及至江户，1658年11月，他应招登江户城拜见了幕府第4代将军德川家纲。第二年4月，幕府下达了允许隐元建寺的决定。

推动中华佛教文化在日本本土创新发展

日本统治阶层的认可与支持为文明交流互鉴打通了渠道。隐元在日本的弘法活动获得了日本皇室与幕府双重体制的承认与支持。1661年8月，位于京都宇治的黄檗山万福寺初具规模，其占地近20万平方米。1663年1月，应德川家纲之请，隐元在万福寺举行“祝国开堂”仪式。1665年，万福寺收到幕府颁发的朱印状，进一步确认了万福寺的正统地位。日本皇室的后水尾法皇虽与隐元未曾会面，但经由龙溪的介绍，二人多次通过书信交流。1667年11月，后水尾法皇成为龙溪的嗣法弟子，因此他也是传承隐元思想的弟子。后水尾法皇曾将隐元比作中国禅宗始祖菩提达摩，将龙溪比作二祖，以此强调隐元法统的正统性。

万福寺成为中日两国佛教文化开展交流的平台。隐元在日本先后住持过兴福寺、崇福寺、摄津普门寺和万福寺。自1661年以来，万福寺的前20代住持，共有16位是由来自中国大陆的僧人担任，他们有的原本就是跟随隐元赴日的僧人，有的则是专门从大陆邀请而至。隐元的另一位日本嗣法弟子铁眼道

光，为了更便利地弘扬佛法，立志要在有生之年完成雕刻大藏经。他用13年时间讲经化募为雕刻大藏经做准备，最终以隐元从大陆带至日本的明代万历版大藏经为底本，刻印出日本著名的《黄檗版大藏经》。其中共收录佛典1618部7334卷，在印制成功之后，铁眼道光将佛典分赠给了日本的分属于不同宗派的3000多家寺院。

日本黄檗宗的创立与发展是明代佛教文化本土化的硕果。隐元在日传播的佛法缘于明代临济宗黄檗派，后经历代弟子传承发展，黄檗宗于1876年在日本正式创立，成为与临济宗、曹洞宗并称的日本三大禅宗派别之一。临济宗创立于13世纪初期、曹洞宗创立于13世纪中期，比黄檗宗至少早成立400年，皆为日本僧人在南宋时期从中国大陆传入发展而成。与另两个禅宗派别相比，黄檗宗至今保留着浓厚的明代佛事仪式色彩，目前所属寺院近400座，信众约35万人。辻善之助在《日本佛教史》中称“隐元东渡，为此暗淡境界辟一大光明，正成为禅宗革新的曙光”。这证明隐元弘法不仅对当时的日本佛教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力量还深远地延伸至后世。

夯实中日两国互相理解的基础

先进发达的明代佛教文化提供了中日文化交流互鉴的丰富源泉。长崎兴福寺、崇福寺的建筑风格，体现的是明代寺院的特点。而在隐元主持下始建于1661年的京都宇治黄檗山万福寺，虽是由日本工匠参照长崎的寺院建造而成，但在建筑细节上又吸收了日本建筑的特点。佛像雕造巨匠范道生应邀于1660年赴日，先为兴福寺、福济寺雕造佛像，后为万福寺雕造明代风格的释迦牟尼佛、十八罗汉等佛像。陈列在东

